

鸦片战争前后 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

YAPIAN ZHANZHENG QIANHOU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XUE SICHAO YANJIU

章永俊 ◎ 著

黄 山 书 社



鸦片战争前后 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

YAPIAN ZHANZHENG QIANHOU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XUE SICHAO YANJIU

章永俊◎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章永俊著. —
合肥:黄山书社,2009.6

ISBN 978-7-5461-0524-6

I. 鸦... II. 章... III. 边疆—史学史:思想史—研
究—中国—清代 IV. K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544 号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9

字 数:220 千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7.00 元

序

吴怀祺

章永俊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一书,现在终于付梓问世了。这部书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世界历史变动的大背景下,讨论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学思潮诸问题,指出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是边疆史地学的主题,学人的思考以及提出的主张,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本书还把鸦片边疆史地研究和 20 世纪 30 年代顾颉刚、谭其骧诸位先生的边疆史地研究联系起来,虽然时代的背景不完全相同,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也有差异,但他们的史学都是为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体现出中国人民强烈反对“列强肆虐,侵袭边疆”的意志。

在论及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学的产生原因,本书从时局变动、从学术传统与变动入手,同时,又注意到西学东传、学者的学术渊源和家学传统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做出具体而微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可取的。

学术的新走向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两者的交

融；而学者的学术承受及学风特点，则彰显学术的个性。这一理念，对于观察以后的近代中国文化也有意义。

我在《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清代卷·题记》中说过，以鸦片战争为下限的清前期的史学，经历了一波三折。在此之前，有所谓的乾嘉史学。乾嘉时期的史学相当丰富，有考证史学、考信史学、经世史学，把“乾嘉史学”仅仅视为考证史学，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产生于嘉道之际的清史学是第三变，时局变动与经学变动，带来了一股史学新风，这就是富有生气的边疆史地学，这个时期边疆史地学，是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扬，是新历史条件下的经世史学。这一时期的学者，也重视考证，但是更突出的是求真致用。

本书讨论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学在学术上创新各个方面，在边疆观念上，在民族思想上，以及在历史编纂学思想上，都有发展。

在论说这一时期边疆史学的产生、发展和意义以后，本书进一步分析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在观察近代历史盛衰方面的意义，从而不断把课题研究引向深入，提出带有理论性的认识，如：要以世界史眼光考察不同国家的历史兴衰；要对历史运动形式及其动力的各个因素进行思考；要讨论科技、人才和社会变革在历史盛衰中的作用。

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富有活力，但最终没有为

史学开拓带来深远的效应。究其原因，时势也，学术也。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学术、史学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摆在人们的面前。以后时局的变化、学术发生的变化，都使人深长思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史研究，也当述往事，思来者。

这本书，原是章永俊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几年又有不少新材料、新成果以及新的论题、新的视角很值得重视。这本书到现在才出版，是迟了一点，但有一段时间的磨炼，也是好事，学术作品应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要成为过眼烟云，了无痕迹。

我希望，也深信章永俊以后会做出更大的成绩。

2009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吴怀祺
---------	-----

绪 论

第一节 边疆史地学研究在嘉道时期的风气变化	1
第二节 近二十年边疆史地研究的历史回顾	13
一、对于边疆史地学科性质的研究	14
二、从嘉道社会与世界的变动中论说边疆史地的 产生与特点	15
三、注意将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研究放在 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	18
四、爱国主义史学思想:边疆史地研究的主题	19
五、边疆史地研究成果显示出方法论具有 重要的意义	22
六、有些成果指出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23
第三节 本论著需要解决的重点与难点	25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

第一节 边疆史地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	29
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动	29
二、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	33
第二节 边疆史地研究兴起的学术原因	37
一、经学变化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	37
二、西学东传的影响	49
三、边疆史地学者的学风与学术渊源	56
第三节 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	76
一、众星璀璨的学者群及其著述成就	78
二、边疆史地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发展	97

第二章 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上)

第一节 筹边谋防的爱国主义边疆观念	108
一、国家一统观念的时代特征	110
二、提倡治理、防御相结合的治边思想与边疆政策	117
第二节 社会批判思潮与边疆观念	139
一、对“放弃”新疆论的批驳	140
二、对昧于边情者和投降派的斥责	143

第三节 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	151
一、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	151
二、弘扬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156
第四节 求实求新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之发展	163
一、不拘成例的史著编纂风格	163
二、求真致用的史地考证	173

第三章 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下)

第一节 以世界史眼光考察不同国家的历史兴衰	190
第二节 对历史运动形式及其动力因素的思考	200
第三节 重视科技、人才、社会变革等因素在历史 盛衰中的作用	210

第四章 边疆史地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及对中国 史学发展的效应

第一节 边疆史地学研究在海内外不同社会阶层 的反响	221
第二节 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局限之探析	232
一、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局限	233
二、边疆史地学研究局限之成因	241

余 论

第一节	两次边疆史地研究高潮的简要比较	249
第二节	发展边疆史地研究的思考	257
主要参考文献及书目		260
后 记		276

绪 论

第一节 边疆史地学研究在嘉道时期的风气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①形成的第一次边疆史地研究高潮肇始于19世纪初祁韵士、徐松等人的西北史地研究。面对时局的重大变化,一批有识之士,如魏源、姚莹、夏燮、何秋涛、张穆、徐继畲等人,为抵御外侮、巩固边防,积极展开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学术旨趣和治学风格的新型学术群体。这批史地研究学者以其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出了一系列边疆史地著作。这些经世作品有力地改变了乾嘉以来传统史学的沉闷局面,也为谋求学术的生存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这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以其适应时代形势的鲜活生机而活跃于史坛,并于鸦片战争前后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而受到时人和后来学者的重视。梁启超曾总结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学研究,说:“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兹学

^① 本文的“鸦片战争前后”时间断限大致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50年代左右,即嘉道咸时期。

遂成道光间显学”。^①

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在中国史学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于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深层次的总结。而且其研究中开掘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新观点,并由此促使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它在诸多方面推进了古代边疆史地研究的进展,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边疆史地学研究是在社会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反映了民族思维的新特征和学术研究的新趋向。从明清以来的学术流变来看,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客观上为近代史学的萌发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第一,就史学总结而言,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学研究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进一步扬弃和发展。

明末清初以来,尤其是乾嘉时期,史学发展呈现出总结与嬗变的特征。^② 史学总结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章学诚对史学理论、史书编纂诸方面的反思和总结;二是乾嘉学者对考证史学的总结。其中,章学诚着重从理论上说明史学变革的必然与必要,反映了史学发展的新动向。遗憾的是,章学诚要求史学变革的呐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曲高和寡的回响。直至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兴起,史地学者才将章学诚的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90、388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②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670页。

史学更革主张真正付诸实践。边疆史地学研究在考证学总结方面也有丰硕成果,这是求真致用的时代精神与乾嘉考据学结合的又一重要贡献。

其一,章学诚的史学更革主张与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章学诚明确指出史学之宗旨是经世而非空言著述:“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①既反对琐碎的考证,也反对空疏无用的理学。章学诚“在复古学的旗帜下,力求史学创新,求史学变革之道”。^②章学诚承浙东史学之余绪,力倡经世致用,反对专务考索的学风,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以史书编纂为例,章学诚对纪传体史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他说:“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③在章学诚看来,由于史学失却创新精神,史书编纂已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他呼吁史书体裁到

① 《与朱少白书》,《章氏遗书》卷29,1922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②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94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③ 《书教下》,《文史通义》卷1,道光十三年(1833)《章氏遗书》本。(下引此书版本同)

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为了恢复史学著作精神,章学诚强调史书编纂当“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贯穿“圆而神”、“方以智”^①的精神,要以变通的思想思考史学的更革。因之,章学诚成为有清一代史学新发展的标志。“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②梁启超颇为推重章学诚,他说:“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学诚)三人而已……故吾曹最痛惜者,以清代唯一之史家章实斋,生乾嘉极盛时代,而其学竟不能为斯学界衣被以别开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家仅以捭拾丛残自足,谁之罪也?”^③至为可惜的是,章学诚的史学见解在当时因不合时宜而成为空谷绝响。然而,章学诚却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系统的理论性的总结,他以变通的思想,思考中国古代史学的出路,对于中国史学新局面的开拓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章学诚的‘变更史学之道’,在古代史学的晚期,显现出史学求新的一线曙光”。^④

我们认为,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学研究正是循着章学诚“变革史学之道”的路径走过来的。从史学经世来看,两者的愿望是一致的。嘉道时期,清代康乾盛世余辉已尽,代之而来的是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时局危艰的社会现实唤起了一些士人的经世观念和忧患意识。尤其是鸦片战争中,“赫赫天朝”竟然大挫于“区区岛夷”的现实,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腐败,这使人们深感奇耻大辱,同时也激发了一些人了解外部

① 《书教下》,《文史通义》卷1。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1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62页。

④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307页。

世界的欲望。面对“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①边疆史地学者重新揭橥史学经世的大旗，强调历史研究要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与章学诚时代不同的是，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学研究真正从实践上继承和发展了章学诚史学更革主张的理论精神，经世之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为矢的的救亡图存成为史地学者关注的焦点。为此，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苦苦思索学术发展的出路，他们根据社会形势急剧变动的需要而研究边疆史地，并与外国史地、蒙元史、明史以及当代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们通过积极了解夷情，介绍边疆地区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等情况，以增进人们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抵御外侮。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安边固防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史地著作也大都能够根据时代变动的客观需要灵活地安排史书体裁、体例，从而容纳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史地撰述不仅体现了章学诚“圆而神”、“方以智”的史书编纂要求，而且糅合了新的时代内容。无论是研究的缘由、宗旨、内容，还是研究的方法，学者的著述皆显示出浓郁的经世特色和变通精神。就此而言，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学研究是对章学诚史学更革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其二，乾嘉考证学总结与鸦片战争前后的边疆史地研究。

乾嘉时期，赵翼、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在考史、评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是乾嘉时期中国历史考证学的代

^①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76页。

表性著作。梁玉绳、洪亮吉、杭世骏、汪辉祖等人对历史考证学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梁玉绳撰有《史记质疑》、《汉书人表考》，洪亮吉撰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杭世骏撰有《两汉蒙拾》、《三国志补注》、《诸史然疑》，汪辉祖著有《元史本证》。此外，有些学者的文集、笔记中也不乏精湛的考史作品。这一时期的考史著作和考订的古籍可谓汗牛充栋。对于乾嘉学者在考证学上的总结之功，梁启超曾评论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乾、嘉间的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①有现代学人指出，乾嘉历史考证学派的史家采用治经学的方法治史，其宗旨在于实事求是，以求真精神考证史书和史实。反对宋明一派史家脱离历史事实而驰骋议论，对历史作主观褒贬。主张史家应当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不失历史的真相。他们的治史范围相当广泛，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辑佚古书、改补旧史、考证史籍等方面。^②这段文字从治学方法、宗旨、范围等方面评说了乾嘉考证学取得的成就。

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学研究在考证学方面的成就，不仅在于它继承了乾嘉考证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其研究方法，而且史地学者在其撰述中，也普遍表达了向世人提供精确可信书籍的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页。

② 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页。

要求。尤为重要的是,史地学者考证的目的是为了致用,他们将史地考证与筹边谋防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示了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如张穆为“稽史籍,明边防”^①而撰《蒙古游牧记》,何秋涛为辨明中俄边界诸问题而致力于撰写《朔方备乘》,等等,他们研究的问题皆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敏感点。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对边界、山川形势、民族关系等事关国家领土、主权以及国内安定团结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考订,其考证成果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经世特征。史地学者的考证体现了科学的理性精神与主体自觉精神的结合,求真致用的统一成为鸦片战争前后考证学总结的显著特色,也是史地学者对乾嘉考证学总结的重要发展,乾嘉之“学精”到道咸之“学新”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第二,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研究发展成一门“显学”,它在研究范围、内容、重心、旨趣、方法等方面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不仅推进了古代边疆史地研究的进展,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为近代史学的萌发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学术界一般以“新史学”的出现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折的标志。所谓“新史学”,是指“它和传统中世纪的史学相联系但又有不同特点的史学,它反映近代社会的现实”。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新的历史哲学认识传统的史学,重新解释历史的过程和历史现象,扩大历史的反映面,同时对旧史学展开批判。二是采用新的史书编纂形式写出各种通史、文化史及各种专史、断代史,出版各种近代的学术期刊

^① 《蒙古游牧记·自序》,同治六年(1867)寿阳祁氏刻本。(下引此书版本同)